

先秦法家富强观念的现代反思^{*}

孙晓春

内容提要:富强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主题。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认识到富强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群体。法家把富强作为国家治理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实现富国强兵的措施。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掌控全部的社会生活,君主利益至上是法家富强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强制手段驱民于农战是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法家的富强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统一的历史进程。法家富强观念的局限则表现为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关键词:法家;富强;奖励农战

“富强”是战国秦汉以来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共同面对的社会主题。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富强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如何处理国家富强与民众生存条件改善之间的关系,也是每个历史时代思想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战国时期的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倡导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的思想流派,在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家首先意识到了富强之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治理的直接目标,把奖励耕战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作为法家治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对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治理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即使是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里,法家的富强观念也仍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历代王朝的治理过程。因此,反思法家的富强观念,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治理观念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战国时期的历史环境与法家学派的富强观念

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归根结底都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冯友兰先生在论及哲学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①冯先生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理解法家富强观念的前提是了解战国时代的历史环境。

西汉末年的刘向曾经把战国时期概括为“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战国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价值重构研究”(14AZZ005)的研究成果。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策书录》)的时代,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战乱频仍。在这一时期,春秋时期列国诸侯孜孜以求的霸主地位已经毫无意义,兼地略土成为战争的直接目的,从战国初年至战国末季,几乎无岁没有战事,规模大者战争双方投入兵力往往以百万计,即使是规模较小的战役也每每有数十万人被卷入进来。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们,饱尝了战争的苦难。民众的生存条件在战国时期持续恶化着,孟子所指斥的“率土地而食人肉”当不是虚言。

战国时期的战争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春秋时期,见诸记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尚有百余个,到了战国初年只剩下二十几个,其中较强大者只有七个。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都意识到,统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

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都十分清楚,最终统一中国的只能是战争中的胜者,而统一对于失败者意味着什么则是不言而喻的。列国要避免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唯一的出路便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强大起来。于是,富国强兵便成为当时列国统治者最为急切的需要。富国强兵的需求所以急切,主要原因就在于,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没有给那些割据一方的统治者留下更多的时间,他们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迅速走向富强,或者沦为弱者而被消灭。富强在本质上所反映的是列国的生存需求。孟子的思想主张所以被时人视为迂阔,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富强是那个历史时代超乎一切的需要。

对于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来说,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为如何实现富强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富国强兵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富有效率的治理结构把社会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把国家的治理过程纳入富强的轨道。这是战国思想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家的富国强兵主张便是与战国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契合度最高的理论构想。

富国强兵是法家特别是以李悝、商鞅等人为代表的战国前期法家核心的思想主题。在法家主导的列国变法运动中,富国强兵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史载,李悝在魏文侯时为魏国做“尽地力之教”,行平籴之法,改革军制,训练武卒,使魏国一度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在秦国变法的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汉书·食货志》),从而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功,恰恰是法家治国理念的成功。到了战国末年,由于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趋势已不可逆转,如何加强君主权、实现稳定的统治秩序成为更为突出的社会主题,但在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学说中,富国强兵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富国强兵是战国法家治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从不讳言国家治理的直接目的就是“富强”。《管子·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在法家看来,富强是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

什么样的国家是有效治理的国家,东西方思想家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解。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设想理想中的城邦时,都认为一个良好的城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人口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应该以城邦拥有“自足”的生活为限。中国古代思想家则认为,良好治理的国家必须是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国家。而法家则进一步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国家富强为前提。“凡为国之急者……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法家认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无论其拥有多少土地和人民都是没有意义的,“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商君书·算地》)富国强兵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关系到当时每一个国家的存亡,国家富强便可以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

利,而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的结果便是国家控制区域的扩大,这是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孜孜以求的,同时也是法家刑名之学一度在列国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法家主张实行鼓励农战的政策。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到了战国时期,虽然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业依然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战国思想家大多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本业,而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却是消耗财富的末业,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农抑商是战国时期大多数思想家的共识。不过,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主张更为严厉。法家认为,当时人们所从事的诸多社会活动,只有农与战才有利于国家富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农战以外的其他事业都应一律加以禁止。

实施奖励耕战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本来危苦不堪的战争与农耕成为唯一有利可图的行业,用法家的话说,就是“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人们的全部利益只能通过农与战获得满足。具体做法就是,国家以官爵、田宅为诱饵,诱使民众投身于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弱民》)民众由于勤于农事和勇于战争而从国家那里得到爵位和田宅,国家则由于民众尽力效死而收到了富强的成效。

法家曾经反复告诫统治者,如果臣民可以在农战以外而获得利益满足,人们就将设法逃避农战而以它途取利,这样,国家必然陷于贫弱。“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商君书·弱民》)所以,要使民众的生活纳入耕战的轨道,当务之急就是堵塞农战以外的一切利益渠道,使人们在耕战以外别无选择。

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军功爵制。世卿制度是周代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西周时期,周王室通过“授民授疆土”的方式,把地方治权授予诸侯、卿大夫,各级封君的权力是可以世袭的。到了战国时期,几乎每个国家都存有一定数量的世袭贵族,国家的各级军政长官大都从世袭贵族中选用。而世袭贵族由于长期养尊处优,往往才不堪任。世袭贵族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富国强兵的障碍。战国前期法家主持的列国变法,大都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作为主要的变法内容。商鞅在秦国变法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奖励耕战的政策不仅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成效,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战国社会官吏选拔制度的变革。

二、法家富强观念的若干特点

法家的富强观念是战国社会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法家不仅认识到了富强在那个历史时代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可靠途径,这是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战国时代所以被人们所接受,并且被融入战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家的富强观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法家的富强观念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君主利益至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用“所有”的观念理解国家,^①在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中,君主是国家当然的主宰,除极少数思想家(如庄子)之外,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都有着这样的价值取向,而法家在君主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则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如韩非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韩非子·外储说右

^①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征,参见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下》)可以据信为战国法家作品的《管子·重令》也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总之,极端强调君主的重要性是法家学派的共同特点。

在先秦法家的观念中,君主与国家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君主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因此,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应该以君主利益为转移。“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管子·任法》)在表面上,这里所说的“公”应该是指国家,但实际上指的却是君主个人,在先秦法家的观念中,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共的设施。按照法家的逻辑,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君主的利益也是至高无上的,而其他任何人的利益都是不正当的“私”利。如果民众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服从君主的利益,则将对国家和君主构成极大的危害,“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商君书·画策》)。

如果说富强是国家治理的目的,那么,国家富强以后还要做什么?就我们的理性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国家的富强固然是重要的,但富强并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良好的国家治理,归根到底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快乐、幸福的生活。不过,法家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却是:“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也就是说,国家如果富裕,在军事上就会强大,军事强大的国家就可以占领更为广阔的领土,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便可以统治更多的人民。战国法家对于富强的全部期求,大抵可以按照这一逻辑加以解释。

其次,法家富强观念依赖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生存,富强目标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全面掌控社会生活。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便走上了君主专制的发展道路,而权力日益向君主手里集中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发展趋势。虽然在春秋时期曾经出现过权力重心下移的情况,但人们在观念上普遍认为,春秋晚期某些国家出现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是不正常的情形。“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国家的最高治权应该由君主掌握。关于这方面的道理,法家阐述得十分清楚,法家把国家治权概括为刑与德两个方面,称之为“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为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君主如欲巩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切不可使这两种权力旁落。“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韩非子·二柄》)按照法家的认识,只有国家权力为君主所有的情况下,国家富强才是有意义的。

古代社会不同于近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为突出。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治理观念,其基本精神是君主权力掌控全部的社会生活,用商鞅的话说就是“出一孔”。“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商君书·弱民》)在《商君书》里,“利出一孔”有些时候又作“利出一空”,文字虽异,意义不殊。商鞅所说的“利出一孔”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利出一孔”意味着国家全面掌控社会经济生活,使社会经济生活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运转,从而使全部的社会生活服从富国强兵的需要。其二,“利出一孔”也意味着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完全是通过行政权力配置的。法家坚决反对在国家以外存在任何能够配置资源的力量,他们把民众不通过君主这一渠道而获得荣誉、财富和地位的情形称之为“私荣”,“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商君书·弱民》)在法家看来,“私荣”的存在不符合富国强兵的需要,因此,必须堵塞民众获得“私荣”的渠道。当国家成为社会资源唯一的供给者的时候,人们的全部利益只能通过国家认可的方式获得满足,这样便造成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高度依赖,民众所能做的只能是服务于富国强兵的事业。

如果说富强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全面掌控社会生活,富强的结果则是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更强有力的控制。在法家看来,愈是良好治理的国家,其社会生活就应该愈是简单,愈是简单的生活愈是容易掌控,是谓“守一者治,守十者乱”。出于这样的想法,法家把国家设计为社会价值的过滤器,而能否服务于国家的富强事业则是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按照法家的认识,只有农耕与战争才是有利于富国强兵的事业,而农战以外的其他事业都是没有价值的。出于这样的认识,法家拒绝承认商业、手工业者以及士人的存在价值,他们尤其仇视拥有知识的士人。“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在法家所构想的良好治理的社会里,国家的所有臣民只能有单一的身份:农民和战士,不得从事农战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战国末年的韩非把那些不能投身于农战的社会成员称为“降北之民”、“离法之民”、“牟食之民”、“伪诈之民”和“当死之民”,而那些能够为君主所用的人则被称为“死节之民”、“全法之民”、“尊上之民”、“生利之民”和“明上之民”(《韩非子·六反》)。总之,能否服务于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法家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

最后,法家富强观念的理论前提是民众的服从,以强制手段驱民于农战是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出于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家认为,治国就是治民,秩序就意味着臣民对君主的服从。“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商君书·画策》)基于同样的道理,富国强兵目的的实现也离不开民众的服从,“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商君书·说民》)法家认为,统治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民众的生活,“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商君书·算地》)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而“驱以赏”、“劫以刑”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基本手段。

法家清楚地知道,务农与战争是人们最不乐于做的事情,“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商君书·算地》)因此,要使民众肯于从事危苦事业,听任人们自主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使民众乐于农战,只有强制才可以奏效。而国家用来强制社会成员的手段可以分为“赏”和“刑”两种,法家认为,刑和赏是驱民于耕战的利器,“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日强。”(《商君书·弱民》)

强制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地把民众的社会生活统一到耕战的轨道上来,法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全部的可能性都源自于人计利而行的本性,“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而计利而行是每一个人的行动法则。按照一般的逻辑,人们总是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去做,而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对自己不利甚至可能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这个逻辑只是在有着充分选择的社会里才是成立的,而法家为人们提供的却是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民众如果勤于农事、勇于战争便可受到奖赏,否则便将遭受责罚,民众在为国家尽力效死以外别无选择。

三、法家富强观念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法家的富强观念是战国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那个时期思想界所能想到的最为简便有效地实现国强的治国方略。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直接目的的治理观念被付诸治理实践以后,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古代社会所以能够在那个历史时代迅速地走向统一,与法家以富强为主旨的治理观念是分不开的。当然,就战国时期的历史实际而言,从分裂的社会状态走向统

一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但法家富强观念被付诸国家治理过程以后,却起到了统一的催化剂的作用。在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的影响下,秦国从最初僻处西戎的国家迅速成为七国之中最为强大的国家,从而加速了古代中国的统一进程。

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直接目的的治理观念,在客观上也为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秩序。在任何历史时代,社会秩序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虽然我们可以说,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是从旧时代走向新的历史时代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社会秩序的动荡毕竟不符合每一个人的愿望,它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要。中国历史上有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国家分裂是动乱的根源,只有统一的国家才会有可靠的秩序。其实,战国时期大多数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国家统一与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怎样才能实现统一,如何才能使战国社会从秩序动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却在考验着古代思想家的智慧。作为中国古代统一的历史进程的助推剂,法家所倡导的富强与秩序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如前所说,法家的富强观念强调国家全面掌控社会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秩序,尽管这种秩序在现代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但这却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人们所能做出的唯一有效的选择。

法家富国强兵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中是有着重要价值的思想成分。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谁愿意生活在贫弱的国家里,因为只有生活在富强的国家里,人们才会有安全感和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事实上,富强不仅对于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人们有意义,它也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主题,富强始终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是为秦汉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是最早感受到富强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群体,尽管在如何实现富国强兵这一问题上,法家所给出的答案并不尽如人意,但法家学派的富强观念却为两汉以后的思想家继承了下来,并且一直在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在这方面,法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贡献尤为重大。

由于对国家治理过程的直接影响,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战国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秦王朝建立以后,法家思想曾一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以富强、法治为核心的法家治理观念不仅没有使秦王朝走向繁荣,相反,秦王朝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在历史上的每一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其终极根源都可以在那个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中去追寻,秦王朝命运短促的原因也同样在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我们这里无意讨论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之间的关系,只是想要说明法家的富强观念本身的理论局限。

首先,法家富强观念的局限表现为道德诉求的缺失。人类是否应该拥有符合道德的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生活是否需要道德原则的约束,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富强的社会里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愿望,自古及今,富强都是我们社会生活目标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看来,富强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富强的目标必须通过合乎道德的方式来实现,否则,富强就是没有意义的虚语。而战国法家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在本质上是一种功利性的目标。追求富强并不错,但法家把富强看作是国家治理的最高目的和绝对的价值尺度,而且,他们在把富强确定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却拒绝接受道德原则对于统治者治理行为的约束。

用非道德的观点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法家把伦理道德视为无用之物,“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在法家看来,统治者的治理行为无需是道德的,只要有利于富国强兵的目标,国家便可以把没有选择的社会生活强加于民众,通过利益诱导和暴力手段驱民于农战,这使得法家的富强观念充斥着暴力倾向。当法家的富强观念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过程的时候,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个社会陷入不道德的困境,而背离人类基本道德诉求的社会生活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由于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本质上体现为对社会大众的剥夺。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很早的时候起,思想家便认识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社会正义是优良社会生活首要条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正确的政体会以单纯的正义原则为依据,而仅仅着眼于统治者的利益的政体全部都是错的或是正确政体的蜕变。”^①在另一处,亚里士多德又说: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统治者并不比被统治者具有更正当的权利”^②。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也有相似的理解,先秦儒家虽然也强调君主利益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但同时他们认为民众的利益也应该受到保护,这是君主不可推辞的道德义务,因此,先秦儒家主张统治者应该按照道义原则来治理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受到道义原则的约束。可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却认为,尽管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只有君主个人的利益是正当的,而其他任何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应该被无条件地剥夺。在法家看来,完美社会生活的标志就是君主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按照这一逻辑,富强也就变成了只是对君主才有意义的事情。

出于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家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理解为完全对立,认为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应该完全以富国强兵为转移,没有必要顾及民众的利益,也绝对不能实行那些符合民众偏好的政策。“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也就是说,民众因为什么感到痛苦,就把什么给予民众。似此,法家所祈求的国家富强,其全部成本都是由民众支付的,而成果却是民众无法分享的。

先秦法家所想象的民众的生存状态是弱势和贫困,因为贫弱的民众对专制国家有着更高的依赖程度。为了使民众永远处于这种生活状态,商鞅提出了“生力”、“杀力”相循环的统治策略。这个策略的要点是,每当民众的财富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通过战争等手段把这些财富消耗掉,“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弱。”(《商君书·说民》)法家的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相当一些统治者的真实想法:他们希图富强,但其目的是为了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是为了民众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惧怕民众的富足。

在理论上说,国家富强是符合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任何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政策都理应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因此,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社会大众做出某种牺牲是理所应该的,因为只有国家富强的时候,民众的安全与富足才是可能的。可是,这一说法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民众为国家的富强做出牺牲的前提,是富强的成果应该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然而,在法家的理论设计中,社会大众只能为国家富强做出努力,富强的成果却为君主一人所独占,社会大众的生存条件并不会因为国家的富强而得到任何改善,富国强兵成了与底层的社会大众不相关的事情。当统治者不肯与民众分享国家富强的成果的时候,法家所说的富国强兵终将变成成为不可持续的事情。

最后,法家的富强观念的局限在于,这种观念把营求功利的特性赋予了国家治理过程。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一点,无政府的社会生活必然是没有秩序和安全的生活,它无法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提供任何帮助。这是国家乃至全部的政治机构所以存在的理由。不过,也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人们也就有理由拥有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我们有理由假定,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一问题上虽然见解各异,但其主观动机却是一致的,都是在寻求良好的国家治理。法家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也同样是出于这样的主观动机。可遗憾的是,法家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的是一个在短期内有效但长远看来却相当有害的

①②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86页,第1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药方。

在法家的治理观念中,国家既是富强政策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富强成果的受益者,而国家又是为君主个人所有的,真实的受益者应该是君主。结果,在谋求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变成了牟利的机器,国家谋求富强的过程实际也就变成了作为政治结构的国家向社会谋取利益的过程。于是,在法家的理论设计中,国家不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安全的结构,国家治理的主要责任不是为社会大众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是如何把全部的社会资源收归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兼并战争频繁发生的战国时代,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或许是法家富强观念的积极方面,但在国家统一局面形成以后,在外部压力有所减弱的情况下,法家以富强为目的的治理观念的局限便充分地暴露出来。史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国家不断地从民众身上榨取资源,“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结果,“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汉书·食货志》)当国家把营求功利当作自己的主要职事的时候,它施加给社会的常是暴政。

虽然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不久,继之而起的汉朝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秦王朝的暴政,但是,法家富强观念对国家治理过程的影响却没有因此而消除净尽。《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教训太子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两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不仅从战国法家以及秦王朝那里继承了以法术刑名治理国家的手段,而且也把法家富强观念的消极因素也继承了下来。从两汉至宋明千余年的时间里,每当富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法家富强观念的消极成分便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来。有些时候,富国强兵竟成为专制国家向社会汲取资源的借口,从汉代的桑弘羊到宋代的王安石,热衷变法的官员历代有之,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营求财利饶有兴趣,甚至有人以为,治理国家就是理财,国家营求财利是天经地义的,而国家营求财利的基本手段便是不断地向社会攫取经济资源,如王安石便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以谓义也。”(《答曾公立书》,《王文公文集》卷八)宋儒程颢曾一语直陈王安石变法要害:“元丰大臣皆嗜利者”(《外书》卷十二)。由于变法本身便隐藏着为营求财利的动机,使得初衷良好的某些新法也大多成了害民之法,北宋熙宁时期的青苗法便是典型的一例。

把专制国家营求财利作为寻求富强的门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观念误区。这种观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过程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两汉以下历代王朝的“富强之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一代王朝都把向社会搜括经济资源作为国家富强的门径,这种求富之术或许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专制国家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可是,一旦社会财富被搜括殆尽,一代王朝的统治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一条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作者:孙晓春,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300071)

(责任编辑:刘杰)